

拉曼大学

中华研究院
中文系

嘉祐时期欧阳修与王安石交谊研究

科目编号： ULSZ 3068

学生姓名： 谢迎欣

学位名称： 文学士（荣誉）学位

指导教师： 余曆雄老师

呈交日期： 05/04/2013

本论文为获取文学士荣誉学位（中文）的部分条件

目次

题目	I
宣誓	II
摘要	III-IV
致谢	V
第一章 绪言	1-2
第一节 研究动机	3
第二节 资料收集与评述	4-5
第三节 研究方法	5-6
第二章 欧阳修与王安石交谊概述	7-8
第一节 非曾巩而不识	8-14
第二节 “不和”之说	14-19
第三章 赠诗争议之辨	20-21
第一节 “敬”抑或“不敬”	21-29
第二节 自比孟子之故	29-36
第四章 唱和之作——《明妃曲》	37-38

第一节	创新中的感慨·····	39-45
第二节	《明妃曲》之论·····	45-53
结论	·····	54-56
参考书目	·····	57-61

嘉祐时期欧阳修与王安石交谊研究

宣誓

谨此宣誓：此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论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文字、电子资讯或口述材料，皆已于注释中具体注明出处，并详列相关的参考书目。

签名：

学号：10AAB02208

日期：2013 年 4 月 5 日

摘要

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皆是擅名两宋，又同为唐宋八大家之列，沾丐文坛多矣，然而历年以来学术界对于两人的研究大多是生平以及著述方面，相对而言，有关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的研究却是少有的。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无论是文坛上抑或政坛上都有很好的成绩，影响后世深远。王安石于宋朝的出现并非偶然，更并非仅靠其才华天赋的结果。王安石少年时便以钻研学问为事，不自度材疏命贱，只以古代的圣人后稷和契自期，可谓是自少年就已确立其志向。

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终荣登进士以后即开始了在各地的宦宦生活，期间王安石在欧阳修的提携下也曾入京师为官。王安石得欧阳修慧眼识才，不断加以识拔延誉，使王安石名声始起。王安石早年的成名与欧阳修有着莫大的关系。王安石既得欧阳修的提携，两人的关系应是良好的，然而历年以来学术界皆称王安石忘却欧阳修提携之恩，与欧阳修的关系不和。纵观两人的交谊，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缔结期、深化期以及平淡期而欧阳修与王安石“不和”之说是始于嘉祐时期的。嘉祐时期，即是两人关系中的深化期同时也是两人关系转为平淡的时期。故此，嘉祐时期对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研究而言，有着很大的研究价值与重要性。

在进入主题内容前，笔者于首个章节中分别对论文的研究动机、资料收集与评述以及研究方法作出论述，主要是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不和”之说竟是始于两人来往频密的深化期，这样的一个状况让笔者深感疑惑，于是便以欧阳修与王安石为研究对象，以期可以促进自己以及他人日后对两人关系得研究。本论文将以嘉祐时期为研究范围，并且以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的深化期，即嘉祐元年

(1056)至嘉祐四年(1059)展开论述。本论文共分为三个章节,分别为:第二章着重于剖析欧阳修与王安石若无曾巩是否相识以及两人“不和”之说;第三章则是论述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交谊中首个“不和”之说,即嘉祐元年(1056)两人首次会面以后相互赠诗却引来王安石对欧阳修“不敬”的争议;第四章则是探讨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创作《明妃曲》二首的心情感慨以及欧阳修所和《明妃曲》中看欧阳修与王安石是否相知。

关键词: 欧阳修 王安石 关系 嘉祐时期

致谢

论文终于完成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满满地感动、感恩与感谢。感动准备已久的论文得以“顺产”；感恩论文遇到瓶颈之时都有恩师——余曆雄老师的指点；感谢身旁永远都有家人、朋友、同学的陪伴。只能说，这一份论文并非是我一个人的，而是靠着恩师、家人、朋友的协助下才得以完成。从实习期间的资料收集与撰写工作，到今日如期完成，过程是“坎坷”的，不断地修改又修改，为的就是希望不要辜负对我有期待的人，希望修改以后，论文可以变得更佳。

犹记得自己刚入大学之时，对于老师口中所言的毕业论文是毫无概念的。懵懵懂懂地度过了大一的时光。直到大二上《唐宋文选》课时，方听闻“毕业论文”这词汇。那时候总觉得，毕业论文离自己还很远，然老师却是告诉我们这时候准备就对了。可惜啊，这句话我是听了，但是我并不明白，也不晓得如何做准备。若是那时候的我听懂了，想必撰写论文的过程定会轻松许多。撰写论文时，我不断告诉自己，不要想太多了，把眼前的做好，尽量不要让日后的自己后悔。

如今，论文已完成，这要特别感谢余老师的悉心教导，自己亦深感荣幸可以成为余老师的学生。我自知资质不高，多亏有余老师一直地教导与批阅，谢谢您老师。同时也要感谢我的同门们，谢谢你们给予我的帮助。最后也谢谢朋友一直忍受我撰写论文时的脾气。感谢你们！衷心地希望自己并未有让你们失望。大学三年，我获益良多。感恩。

第一章 绪言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黄进德，1998：1）王安石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字介甫，号半山。（詹大和，1994：1-3）欧阳修与王安石都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更被后人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两人同是宋朝著名的政治家与文学家，其中王安石所推行的变法影响深远，是中国历史上必谈的历史事件。欧阳修更曾任知制诰、翰林学士一职，并以太子少师致仕。欧阳修一生乐奖掖后辈，王安石就是其中一员，早至庆历时期，王安石刚入仕途，便得欧阳修慧眼识才，使其仕途平步青云。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虽是师生关系，然两人的关系却是自两人首次会面以后便有“不和”之说。因此，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包含着研究价值。

在众多后起之秀中，王安石与欧阳修的情谊的确是最为独特。欧阳修与苏轼、苏辙的关系良好是学术界都公认的，欧阳修与苏轼兄弟的往来从未间断，甚至于欧阳修逝世以后，苏轼依然与欧阳修之子亲密往来，而后欧苏两家更是结成姻亲。ⁱ 欧阳修对于曾巩更是赏识，曾巩尚未考中进士就已结识欧阳修，欧阳修亦曾言“**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可见曾巩与欧阳修关系亲密。清代张伯行有曰：“**欧阳公之门尽罗天下之名士，而子固称首**”，曾巩是深得欧阳修欢喜并屡受欧阳修称赞。（李震，1997：46-49）王安石却不然。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结识全因曾巩极力撮合，而此后两人的往来亦未有得到好评，反而引来了两人“不和”之说。

纵观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往来，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颇为微妙。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生平的交游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庆历时期两人彼此倾慕，以诗文缔结的缔结期；嘉祐年间两人关系深厚，不时皆有聚会的深化期，以及后期两人即没诗文往来亦无相聚见面的平淡期。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是否“不和”历年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有学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不和乃是出于欧阳修反对王安石之熙宁变法，亦有学者认为其实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早在嘉祐元年（1056）相互赠诗之时已有嫌隙。学者们一一举例，评论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种种“不和”之故。

从嘉祐年间一直至熙宁年间，究竟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交谊是何时生变，关系变疏的原由又是什么，学者们都未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众多评论中两人的“不和”争议竟是由嘉祐元年（1056）开始的。嘉祐元年（1056）是两人彼此倾慕已久以后首次会面之时，两人会面以后相互赠诗。期待已久的会面未有为两人的关系带来佳话，相反地却是引来“不和”之说。因此，笔者认为研究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是否融洽更应该以嘉祐时期为起点，将嘉祐年间两人的关系得出一个总结，而论文将以两人关系中的深化期即嘉祐元年（1056）至嘉祐四年（1059）年作为研究范围，期冀能得出结论何以两人在深化期就传有“不和”，两人的关系于深化期究竟是好是坏。

第一节 研究动机

欧阳修一直是古典文学研究备受关注的人。欧阳修享有“宋代之韩愈”的称号，于宋代文坛有着崇高的地位。苏轼序欧阳修《居士集》亦有言：“士无贤不肖，不谋而同曰：‘欧阳子今之韩愈也’”，（[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1986：316）曾巩更曾经赞叹欧阳修为“况大贤长者，海内所师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轻重”。（[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1984：234）由此可见，欧阳修于当代的影响力是可媲美古时韩愈的。笔者发现欧阳修乐荐拔人才而其所荐文士人数甚多，且才华皆高。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家之多。宋文六大家之中其余五家皆曾获得欧阳修的指点与提拔，可见欧阳修慧眼识英雄。

目前对于欧阳修的研究重点皆在其生平、著述、评价等进行。有关欧阳修与其所提携的文人关系研究并不多。宋代六大家当中，学术界主要关注于欧阳修与曾巩的关系研究抑或是欧阳修与三苏的关系研究较多。欧阳修与三苏的关系良好，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而其中又以苏轼最得欧阳修热心揄扬，而曾巩则是最得欧阳修真传之弟子，其文最得欧阳修赞赏，关系甚为融洽。然而，在翻阅了各个相关研究的书籍以后，笔者发现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争议甚多，并且一直未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究竟两人为何而“不和”。在得知此现象以后，笔者感到好奇，何以宋代六大家中其余五大家皆曾得欧阳修赏识，而唯独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引起争议，且两人之间“不和”之说竟是由嘉祐元年（1056）两人首次会面已有。因此本文意欲深入地、细致地研究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力求能展现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情谊，同时期冀可以出一个总结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是否融洽。

第二节 集料收集与评述

作为唐宋八大家的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研究范围可谓是相当广泛的。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其推行的熙宁变法以及文学成就影响后世颇深。围绕与熙宁变法以及王安石的诗文研究历年以来都有。同样的有关欧阳修的各个研究亦有较为全面的著述，举例而言刘德清所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的《欧阳修论稿》就细致地将欧阳修各个面貌论述。然而就目前学界研究现状来看，有关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的研究，相对于两人各自的专题研究，尚是薄弱的。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研究目前仅见部分学术论文或著作中提及。著作方面，通常是以专门的一章论述欧阳修或王安石个人的交游考略。在这种情形下，主要是以欧阳修或王安石其个人为出发点，谈论他们与各个文士的交谊。这一类的著作中会有论及欧阳修与王安石的情谊，然这也仅仅是将两人的相识过程一一叙述而已，篇幅不大，未有深入地探讨两人的关系。举例而言，《王安石评传》中第七章就有论述王安石与范仲淹、张载、司马光、苏轼等北宋诸子的关系，而其中第五节就有提及王安石与欧阳修。然内容只大略说明了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文学思想以及政治理念异同点，并将王安石与欧阳修的分歧以及王安石与司马光、苏轼等人的分歧作比较，最终得出结论为王安石与欧阳修之间的正面冲突不及他人，王安石对欧阳修诗中怀有崇敬之情的。

顾永新 2003 年出版的《欧阳修的学术研究》一书中，亦有一章《从欧阳修的交游看其学术渊源及影响》。这一章先后提及了欧阳修与范仲淹、尹洙、刘敞等人的交谊，其中亦包含了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交谊。再看论文方面，与本论文有直接相

关的有由李之亮教授所指导的硕士论文《王安石交游考辨》以及王水照教授所指导的博士论文《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里有提及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研究。两份论文皆是概述欧阳修与王安石相识的过程。第二届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童强学者亦有作《论王安石的诗坛交往》一文，内容亦有简单叙述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

除了以上所提的论文以及著作，翻阅刘德清的《欧阳修纪年录》、詹大和等撰、裴汝诚点校的《王安石年谱三种》、洪本健的《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与《欧阳修资料汇篇》皆有详细记载欧阳修与王安石往来的事迹。而在高海夫主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李逸安点校的《欧阳修全集》、洪本健校笺的《欧阳修诗文集校笺》、李之亮笺注的《王荆公文集笺注》等的选集或文集皆有对欧阳修或王安石的文学作校注，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相互赠送的诗文书简皆可寻获。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欧阳修与王安石的情谊由庆历年间开始一直至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逝世，共有二十馀年，当中还横跨了三朝，即宋仁宗、英宗以及神宗。故此，笔者认为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关系需以阶段性进行。本论文的研究重点将是着重于嘉祐元年（1056）至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研究。因此本论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以《宋史》或两人的评传——《欧阳修评传》以及《王安石评传》为基础，再透过刘德清《欧阳修纪年录》以及洪本健《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梳理欧阳修与王安石往来的各个资料记录。

此外，论文也运用了《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王安石全集》以及《欧阳修全集》等的文集，增加笔者对欧阳修或王安石的文学认识，从他们的作品中分析与推断，理清他们的思想情绪，以了解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情况。笔者以王安石及欧阳修两人的作品分析，除了注意两人直接的诗文往来作品，亦关注两人间接往来的作品。

笔者亦翻阅了宋人笔记，以便可以更全面性了解欧阳修与王安石，同时也能整理出对于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各个评价。为求可以客观地、全面地展现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交谊。同时，笔者亦通过其他文士如曾巩、梅尧臣、苏轼的事迹来梳理两人的关系与作品，尝试以不同的角度分析切入，作为研究两人关系的辅助资料。本论文也参考了有关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研究的时相关的期刊论文，协助笔者对于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资料掌握。

本论文一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主要是详细叙述欧阳修与王安石的相识过程，旨在清晰梳理两人的关系。第二章则论述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与王安石会面以后，相互赠诗表达倾慕之情，却引起后人议论一事。第三章所谈论的是初入仕途的王安石凭其诗作《明妃曲》二首轰动文坛，一众文士纷纷唱和一事。此两章分别是以欧阳修以及王安石为核心，一是探讨王安石是否对欧阳修存有“不敬”之意，一是剖析欧阳修是否是王安石之“知心”人，并期以能将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年间的“不和”之说一一理清。

第二章 欧阳修与王安石交谊概述

欧阳修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不但于文坛拥有非凡的成就，而且还成功为文坛入住不少新血。据《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云：“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修即游其声誉，谓必显于世”。（[元]脱脱，1985：10381）欧阳修慧眼识才，奖掖了不少后辈，宋文六大家中的后五家皆分别得到欧阳修之赏识，使文坛大发光彩。欧阳修是王安石的伯乐，王安石尚未有名气之时，欧阳修就已不断地提拔王安石。在欧阳修的奖掖下，王安石渐有名声，仕途更是平步青云。

欧阳修与王安石结识于庆历四年（1044），由于王安石初入仕途、名声未响，于是好友曾巩积极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庆历七年（1047）曾巩持王安石之文前往滁州拜访欧阳修，欧阳修阅王安石之文以后，对王安石之才大为赞叹，尚未与王安石会面便极力于朝廷上推荐王安石。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相互倾慕却始终未能会面，直至嘉祐元年（1056），王安石入朝为群牧判官，彼此倾慕的两人终于得以会面。首次会面，两人畅谈良久，相处愉快。欧阳修对王安石十分器重，作《赠王介甫》诗赠送于王安石，王安石亦作了《奉酬永叔见赠》一诗回赠于欧阳修。除了相互赠诗以外，嘉祐初年，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来往频密，生活上两人相互关怀，不时皆有聚会。然自嘉祐五年（1060）始，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生变，再无任何交集。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一文赠予王安石，两人之间的往来竟是相隔十馀年以后。隔年，欧阳修便病逝，享年六十六。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友情也随着欧阳修逝世而画上句点。

纵观欧阳修与王安石生的交谊，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即缔结期、深化期以及平淡期。庆历四年（1044）欧阳修与王安石因曾巩而结识，两人尚未会面，这时期的两人对彼此的认识仅限于文字上，关系上不融洽，是两人缔结期。然两人的关系于嘉祐元年（1056）会面以后却已改变。欧阳修与王安石除了文字上的往来以外，亦有实际的交谈与聚会，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友情深厚。而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与王安石减少往来，则是两人关系的平淡期。自古学者皆认为，熙宁变法的开始，是欧阳修与王安石“不和”的原由，亦有部分学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早至嘉祐初年之时已有嫌隙。故此，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于嘉祐年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要的。嘉祐年间，是两人关系最为深厚的时期，却也同时是两人关系生变的时期。因此，本章将分为两节详细交代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与互动，以及围绕于两人关系中的“不和”之说。

第一节 非曾巩而不识

嘉祐以前，即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缔结期，当时王安石于扬州任淮南判官，是寂寂无名初入仕途的初生之犊，而欧阳修则肩负谏官一职，深得宋仁宗的重用。王安石与欧阳修能相识，乃是曾巩穿针引线之故。庆历四年（1044），曾巩于《上欧阳舍人书》一文中向欧阳修推荐王安石，声称王安石是“古今不常有”的人物，希望王安石能“进之于朝廷，其有补于天下”。曾巩表示：“**当世之急有三：一曰急听贤之为事，二曰急裕民之为事，三曰急力行之事。……如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不可失也**”。（[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

1984: 235-237) 曾巩随函更献上王安石之文，然书简抵达之时欧阳修已出使河北，未能阅读。

庆历六年（1046），曾巩再作《再与欧阳舍人书》一文，除了推荐王安石以外，同时亦推荐了王回以及王向。

巩顷尝以王安石之文进左右而以书论之，其略曰：巩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1984: 248)

两封信函，曾巩一再推荐王安石于欧阳修，可见曾巩对王安石是非常赏识的。曾巩引荐王安石于欧阳修一事，距离曾巩与王安石相识之时不久，两人诗文往来非常频繁。对于上一次未能成功引荐王安石，曾巩耿耿于怀，一直未敢忘记。信函中，曾巩虽亦有推荐王向与王回，然曾巩亦是透过王安石而知此二人。曾巩相信王安石甚至，览王回与王向两人之文，发现两人如王安石所言，故一同引荐。

庆历七年（1047）八月，曾巩持王安石之文前往滁州登门拜访欧阳修。据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的记载，欧阳修阅王安石之文以后赞叹评赏不已。

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又尝编《文林》者，悉时人之文佳者。此文与足下文多编入矣。至此论人事甚众，恨不与足下共讲评之，其恨无量，虽欧公亦然也。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1984: 254)

曾巩此行不但与欧阳修见面，且盘桓二十日之久。曾巩使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结识，更让欧阳修得知王安石之才华。欧阳修阅王安石之文以后，更指出王安石不足之处，言孟子、韩愈之文造诣虽高，然王安石作文章无需仿两人。欧阳修赏识王安石，阅其文以后，欧阳修迫不及待欲以王安石会面，曾巩亦有邀请王安石到滁州，却未果。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推荐王安石为群牧判官。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虽未会面，欧阳修却已于朝廷上极力推举王安石，可见欧阳修对于王安石的赏识。同年三月，王安石上《辞集贤校理伏》，以“祖母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昏嫁葬送之窘，比于向时为甚”为由，连上四伏辞不就。（[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73）尽管如此，欧阳修依然进言，任用王安石，“欧阳公言，群牧司领内外坊盐，判官比他司俸入最优。乃以公兼群牧司判官”，（詹大和，1994：5）而后欧阳修再次推举王安石、吕公著任谏官。欧阳修这么评论王安石：“伏见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学，为众所推，守道安贫，刚而不屈”。（[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1653）王安石初入仕途就已得到欧阳修这一前辈的注意，实属光荣。欧阳修《荐王安石、吕公著札子》一文中称：“殿中丞王安石”，可知王安石时犹未就任群牧判官。虽然王安石以祖母年高辞命，未有任谏官一职，婉拒了欧阳修，却未损欧阳修对其赏识之情。

如前所提，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结识，曾巩扮演了穿针引线的角色。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缔结期，曾巩始终参与其中。然，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若无曾巩参与其中，能否结识呢？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对彼此早有倾慕之意，却未有机缘结识，而曾巩在这两人的关系中所扮演的正是让两人结识的机缘。《宋

史·曾巩传》记载：“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荐之欧阳修”，曾巩将王安石荐于欧阳修乃是出于王安石名声未响之故。（[元]脱脱，1985：10392）庆历元年（1041），王安石赴京应礼部试，与曾巩相识并定交。曾巩的为人学问，为王安石所钦佩；王安石的道德文章，亦为曾巩所称誉，两人相交甚深。（张祥浩，2006：58）曾巩除了推荐欧阳修以外，同样地亦致信于蔡襄与袁陟等人，对王安石极力推荐。在曾巩的立场而言，赏识好友王安石的可以是蔡襄亦可以是袁陟，并非只有欧阳修一人而已。这一点亦可从曾巩的两次书简中看出，曾巩于书简中向欧阳修强调“如今时所急”，如王安石道德文章皆优者，不可错失。曾巩亦是如此向蔡襄等人形容王安石。由此可见，曾巩致信于欧阳修、蔡襄等人乃是其赏识王安石的道德文章之故，希望朝廷能重用王安石。

再言，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往来，历来学术界皆言始于庆历四年（1044）年，即曾巩将王安石推荐于欧阳修之时。然而庆历四年（1044）年，并非欧阳修首次听闻王安石之名。按《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的考辨，早在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书信于沈邈便有称誉王安石诗作。（洪本健，1999：67）欧阳修赞誉道：“介甫诗作甚佳，和韵尤精，看了却希示下”，显然庆历三年（1043）之时，欧阳修已阅王安石之诗并曾听闻王安石之名。（[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2435）欧阳修平生喜掖后辈，欧阳修虽已阅王安石之诗并赞誉王安石，却未有任何提携王安石之意。然从欧阳修的话语中，不难发现欧阳修对王安石是赏识的。曾巩《上欧阳舍人书》亦有载：“尝与巩言：‘非先生无足知我也’”，可见王安石对于欧阳修也是非常倾慕，认为欧阳修是“知我者”。（[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

周点校，1984：237）显然王安石曾对曾巩言及其对欧阳修之倾慕，故此曾巩继书简以后特持王安石之文前往滁州于欧阳修。

王安石于扬州任淮南判官之时，其上司韩琦有收王安石为门下幕僚之意。然王安石认为韩琦是“非知我者”而拒绝了。王安石虽是初入仕途，却颇有原则。王安石在扬州，尚未成家，但他不像当时其他青年，一踏入仕途即废书放逸，相反地王安石致力于学。（张祥浩，2006：57）据《邵氏闻见录》载：

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寝，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少年，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魏公后知荆公之贤，欲收之门下，荆公初不屈。（[宋]邵伯温，2003：765）

王安石自小便治学严谨，博览群书。《邵氏闻见录》的记载可见王安石于扬州读书之勤苦，公事之余，依旧力学不已。王安石拒绝了“非知我者”的韩琦全因韩琦对其有误解而不愿入韩琦门下。然王安石曾言欧阳修乃是“知我者”，换言之，欧阳修对王安石而言是比韩琦更为重要。王安石倾慕欧阳修，能获得欧阳修的赏识，必是其所期盼的。

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对彼此的倾慕是早于庆历四年（1044）曾巩尚未有引荐之举之时。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于庆历三年（1043）就已开始。这一种关系是维系于诗文上的关系，两人透过诗文“不自觉地”对彼此都有倾慕之情。虽然两人未有直接的交集，两人所作的诗文亦非为彼此而书写，然两人却透过文字相互知晓彼此。欧阳修与王安石的结识是由文字中“不自觉地”结识。笔者认

为这种文字上的结识是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的起点。古今学者皆言曾巩引荐王安石于欧阳修是两人关系的起点，笔者是不认同的。曾巩几次引荐王安石同样地亦是以王安石之文使欧阳修对王安石有所认识。这一点与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阅王安石之诗而赞誉王安石并无异，欧阳修与王安石同样地依然是因文字而缔结的关系。若依古今学者所叙，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曾称誉王安石之诗一事必被忽略。故此，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的缔结应以庆历三年（1043）为始，如此一来才能还原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友情开始的原貌。

庆历时期，欧阳修被贬滁州。滁州，山不通车，水不载舟，交通闭塞。但是慕欧阳修之名不避僻远，到滁请益求教者仍不绝于途。有姓名可考者就有章生、王向、孙秀才、徐无党兄弟等人。（黄进德，1998：144）欧阳修虽处滁州，然倾慕欧阳修的后辈人数甚多，且都不辞劳苦前往滁州向欧阳修赐教，其中也包括了曾巩。于滁州时，曾巩持王安石之文示以欧阳修，欧阳修大为惊叹，更表示欲将王安石之文编入《文林》中。据吴子良《荆溪林下偶谈》卷三载：“欧公凡遇后进投卷可采者，悉录之为一册，名曰《文林》”。（[宋]吴子良，2003：503-504）《文林》是欧阳修集合众多后进优秀诗文的书册，欧阳修欲将王安石之文编入《文林》，可见继王安石之诗以后，其文又充分得到欧阳修的肯定。欧阳修于至和元年（1054）对王安石有了提携之意，与朝廷上推荐王安石为谏官，主要是王安石之诗文使欧阳修更为认识王安石，认为王安石如曾巩所言是“古今不常有者”。

纵观欧阳修与王安石的缔结期，两人的关系皆是维系于诗文上。庆历四年（1044）以前，曾巩尚未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牵线，两人却早已对彼此相互倾

慕。两人的倾慕之情是透过阅读彼此诗文而产生的，换言之两人在不自觉中就已结识了彼此。曾巩引荐王安石于欧阳修，将王安石之文示以欧阳修，只不过是提供一个平台让欧阳修更为认识王安石。然由始至终，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对彼此的认识都是建立于文字上。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中，并非无曾巩而不识。历来学术界谈论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皆是以庆历四年（1044）开始论述，这一点亦不可取。且不论曾巩并非仅仅引荐王安石于欧阳修一人而已，笔者认为曾巩在两人关系中辅助不大。曾巩的参与只是让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由“不自觉地结识”转换为“双方自觉地结识”而已。两人对彼此的感情在曾巩穿针引线以后仍旧保持为相互倾慕的关系，未有任何改变。

第二节 欧阳修与王安石“不和”

前节提及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并非无曾巩而不识，两人的关系是建立于文字上的认识。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在曾巩尚未有引荐之举时，就已对彼此相互倾慕。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在阅读王安石之文以后，迫不及待欲以王安石会面，然两人会面却是于嘉祐元年（1056）之时，距离欧阳修言欲以王安石见面已有十一年之久。在这十一年期间，相互倾慕的两人虽无法会面，然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尚未与王安石会面便已推荐王安石为群牧判官，可见欧阳修对王安石是极其器重的。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于嘉祐元年（1056）会面以后，开始转变，两人的关系不再仅仅维持于文字上的交流而已。会面以后，两人的关系除了是诗文上的关系，亦有了现实中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实际关系。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在相隔十一年以后终于会面。两人首次会面，畅谈良久，大有意犹未尽之意。据王安石《上欧阳永叔书一》所云：“今日造门，幸得接余论，以坐有客，不得毕所言”，可见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相处愉快。（[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1277）两人会面以后，更相互赠诗再续情谊。欧阳修作《赠王介甫》诗表达其对王安石的赏识，而王安石亦作了《奉酬永叔见赠》为答诗。倾慕已久的两人继会面以后再作诗互赠，本应是美事一桩，奈何两人的赠诗却是引来“不和”之说。同年，欧阳修亦有作《再论水灾疏》称誉提拔王安石，唯王安石再次拒绝了欧阳修的举荐。王安石更于《与欧阳永叔书》中向欧阳修陈述其婉拒的原由，“窘迫之势，比之向时为甚”，希望欧阳修能够谅解其请求外任的心意。（[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1278）

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设宴为裴煜饯行，王安石亦有出席。龚颐正《芥隐笔记》有载：“荆公在欧公座，分韵送裴煜知吴江，以‘黯然销魂，惟别而已’分韵。”（[宋]龚颐正，2003：491）王安石不但参与了欧阳修的活动，更于宴会上展现其才华，与众宾客分韵作诗赠予裴煜。宴会上除了有欧阳修这一文坛前辈存在，梅尧臣、苏洵、杨褒、王安国、姚辟、焦千之皆在席，而王安石依然与他们相处愉快，关系融洽。同年冬，王安石再次与欧阳修相聚，“聚座分题《赋虎图》，王安石妙手先成，欧氏为之袖手”。（刘德清，2006：291）王安石不但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见面，王安石所作《虎图》一诗更是让欧阳修赞叹。王安石继会面以后不断出席欧阳修的活动，其诗作更备受欧阳修肯定。

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出知常州，欧阳修亦为其饯行。王安石亦作了《上欧阳永叔书》三篇，以谢知遇之恩。同年，欧阳修从刘敞处得知王安石有作《平山堂》诗。平山堂是庆历时期欧阳修于扬州所建造的，文人到此处多有题咏，王安石亦不例外。王安石此诗以描绘景色为主，寓景于情，感慨“墟落耕桑公恺悌，杯筋谈笑风流”。（[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849-850）而后，欧阳修致信函于刘敞时有云：“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以相告”，（[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2419）可见欧阳修非常喜爱王安石之诗作，给予王安石极高的评价。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友谊以文字缔结，两人首次会面以后，王安石频繁地出现于欧阳修的交游圈子，感情变得更加深厚。欧阳修与王安石除了文字上的往来以外，实际相处亦非常愉快，故此嘉祐初年是两人友情的深化期。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更作了《明妃曲》二首，咏史抒怀，传诵一时。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人都有唱和此作，其中又以欧阳修所和的《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以及《再和明妃曲》最为人知晓。《明妃曲》可谓是欧阳修以及王安石两人之间最著名的唱和之作。王安石的《明妃曲》虽引起文坛轰动，然众学者与王安石的唱和之作皆有异同之处。《明妃曲》作为嘉祐四年（1059）文士们著名的唱和课题，同样也引来了不少争议。欧阳修虽有唱和王安石之《明妃曲》，然欧阳修是否有赞同王安石，成了后世学者论述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是否融洽的关键。再者，欧阳修与王安石自嘉祐四年（1059）唱和以后，两人的往来不再频密。翻阅欧阳修与王安石各个研究材料，皆未能寻获任何有关两人往来的迹象。故此，古今学者有了欧阳修与王安石于嘉祐年间就已“不和”的推测。

嘉祐四年（1059）以后，欧阳修与王安石鲜少来往。两人之间热络的关系几乎是急速降温，这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两人早期的关系是良好，无论是缔结时期抑或是友情深化期，间中虽有诗作上的争议，然这些争议皆是后世读者的评价，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仍然相互往来。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嘉祐元年（1056）往来频密以后便不再有文字上的往来，是促使历来学者们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生变主要原由。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一直至熙宁四年（1071）才有交集。熙宁四年（1071）欧阳修作《贺王相公拜相启》一文赠予王安石，然欧阳修亦是于此年获许致仕退居颍州。而后熙宁五年（1072）欧阳修病逝，王安石、韩琦、曾巩、苏轼、苏辙等皆有祭文。

《贺王相公拜相启》以及《祭欧阳文忠公文》是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四年（1059）以后仅有的两篇文章往来。依据《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记载，王安石对于欧阳修仍然是非常倾慕友好的，欧阳修的逝世亦让王安石扼腕叹息。

然天下之无贤不肖，且犹为涕泣而献欵。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从，又予心之所向慕而瞻依？……而临风相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复见，而其谁与归？（[明]茅坤编，高海夫主编，1998：3616）

王安石之《祭欧阳文忠文公》一文写得精彩，不但概括了欧阳修一生仕途坎坷，也叙述了欧阳修的道德节操。祭文中，王安石表示欧阳修是其倾慕且亲近的前辈。王安石这篇《祭欧阳文忠公文》亦得到了很好的评价，茅坤云：“欧阳公祭文当以此为第一”，（[明]茅坤编，高海夫主编，1998：3619）可见王安石这篇祭文写得比曾巩、苏轼、苏辙、吴充等皆曾得欧阳修提拔的后辈更为优秀。

王安石撰写《祭欧阳文忠公文》是正值厉行新法之际。欧阳修对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是有反对的，甚至上言于神宗慎重考虑王安石之新法。（张祥浩，2006：398）两人继嘉祐四年（1059）以后再无诗文上的交集，政坛上的关系亦不甚愉快。然王安石所作《祭欧阳文忠公文》一文却可以看出王安石对欧阳修深怀崇敬之情。作为受欧阳修提携的后辈，王安石认为欧阳修其文其人皆是文士们的典范。王安石与欧阳修虽于政治上有分歧，却始终尊敬欧阳修。如此看来，王安石与欧阳修虽于诗文上未有交集，政坛上是敌对的立场，两人的关系却依然是友好的。尽管如此，部分学者亦提出了王安石所撰的祭文无法确切论证两人关系融洽的看法。学者认为欧阳修已逝世，王安石所撰写的祭文则不可能贬低欧阳修。祭文只能显现出王安石写文章的造诣，却无法说明王安石与欧阳修实际的相处情况，而欧阳修与王安石政坛上的敌对却是史载的，更为可信。故此，学者们总结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生变乃是新法之故。

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入朝为三司度判官，任职期间更曾奉诏伴送契丹使臣回国。而后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则任职知制诰，替皇帝起草诏令、制文等等，虽无多大实权，却是最接近皇帝的一职。（张祥浩，2006：60-93）翻阅文献，笔者发现王安石于这期间除了鲜少与欧阳修往来以外，亦鲜少与其他文士有交游。王安石在任知制诰期间，因生活于与统治者有密切关系的圈子，深感现实的人事关系颇为复杂。故此嘉祐后期，王安石皆未有与任何人深交。可见这期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转为平淡乃是王安石自身的原由。王安石与欧阳修于文字上无交集，却也未影响两人的关系。笔者认为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时应分辨两人之间究

竟诗文、官场抑或是实际关系“不和”。以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时期的事迹而言，引起两人“不和”之说的主要是诗文关系上。诗文上欧阳修与王安石未有交集，亦可以是两人于诗文上的关系不融洽而已。欧阳修与王安石究竟是否有“不和”还需一一探讨。

纵观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往来的经过，自嘉祐时期始就已出现两人关系是否融洽的议论。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是有阶段性的，而嘉祐时期则含括了两人关系中的两个阶段，分别是深化期以及平淡期。故此，理清嘉祐时期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是否友好是极为重要的。笔者认为嘉祐四年（1059）以后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虽未有任何文字上的往来，然这并不意味着两人的关系不友好。

历来学者论述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不融洽的说法，乃是由嘉祐元年（1056）开始。此年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初次会面，却已引起后世学者言及两人“不和”。这一点着实让笔者疑惑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的原貌。两人果真如学者们之论述会面不久便已“不和”，抑或是“不和”之说乃是误会？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是结合了诗文、官场以及实际相处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的确是相互影响着，学者们就以一种关系来论证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是“不和”未免武断了。笔者认为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于嘉祐年间的关系，需以欧阳修与王安石于诗文上是否有“不和”以及这种诗文上的“不和”是否影响了两人实际的关系为主，如此一来则能辅助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是否因新法的推行而“不和”了。

第三章 赠诗争议之辨

嘉祐时期含括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关系中的深化期以及平淡期。嘉祐元年（1056）直至嘉祐四年（1059）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来往频密，友情深厚，是两人感情的深化期。然，在两人关系转化为深厚的这时期，却也有两人“不和”之说。纵观欧阳修与王安石的交集，首次引发“不和”议论的正是两人于嘉祐元年（1056）会面以后相互赠诗一事。嘉祐元年（1056）欧阳修守丧期满后被诏还京，而王安石亦于京师任群牧判官一职，两人同在京供职，让倾慕已久的两人终于得以晤面。

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之母病逝，欧阳修南下于颍州居丧。至和元年（1054）五月，欧阳修丧服期满，复旧官。（刘德清，2006：255）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至和元年九月癸亥的记载：“翰林学士六员。时杨察、赵槩、杨伟、胡宿、欧阳修并为学士……”。（[宋]李焘，1986：4279）可见，欧阳修南下为母归葬以后复旧官乃是任翰林学士一职。除服后的欧阳修曾一度要求外任，然仁宗不许。而后欧阳修觐见仁宗时，仁宗恻然，“怪公鬓发之白，问公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并赏赐对衣于欧阳修，可见复官后欧阳修深得仁宗重用。（刘德清，2006：256）嘉祐时期的欧阳修无论是政坛上或是文坛上皆非常有影响力，欧阳修唯才是举，是文士们倾慕的对象，王安石亦不例外。

相互倾慕已久的欧阳修与王安石于嘉祐元年（1056）首次会面，两人相见甚欢，会面以后更相互赠诗。欧阳修作《赠王介甫》诗，诗中欧阳修以李白、韩愈勉励王安石，表达了其对王安石的器重。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
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2009：1475）

王安石拜谒欧阳修以后，得欧阳修之诗，亦作了《奉酬永叔见赠》予欧阳修。诗曰：

欲传道义心虽壮（一作“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
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坐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
旣岂宜蒙。（[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827）

欧阳修与王安石这两首互赠的诗歌正是属于歌颂友谊诗作的类型。（汪国林，2009：32）两人初次见面，礼尚往来，就此推测两人的关系是不错的。王安石是倾慕欧阳修的，然王安石所作之诗却是引来了对欧阳修不敬的议论。故此，本章将探讨欧阳修与王安石相互赠诗一事所引发的议论，并分为两节以理清历年以来学术界对于赠诗一事的看法是否存有误解以及何以王安石于诗作中自比孟子，并期许能得出结论两人之间关系是否融洽。

第一节 “敬”抑或“不敬”

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都是名留青史的人物，两人初次会面本是文坛佳话，然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赠诗却引来了不少非议。两人的会面并未如预料中成为文坛佳话，相反的，产生了两人关系不融洽之说。如前所提，这两首诗属歌颂友谊的诗作，即表达欧阳修对王安石之器重以及王安石对欧阳修仰慕之情。何以会产生歧义

呢？是否学者们有所误解？纵观历代对王安石《奉酬永叔见赠》一诗的解读，引起歧义的主要是诗中“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一联。此联的解读甚为重要，若是解读有误将会导致欧阳修与王安石关系不和谐之说，并且成为两人关系不融洽最有力的凭据。故此，本节将会探讨王安石之诗究竟是否存有对欧阳修不满不敬之意。

历来学术界对于王安石之诗作解读甚多，学者们大多都认为王安石之诗作对欧阳修是“不敬”的。欧阳修以及王安石相互赠诗，认为王安石对欧阳修不敬之议，首出叶梦得《避暑录话》。

王荆公初未识欧阳文忠公，曾子固力荐之，公愿得游其门，而荆公终不肯自通。至和初为群牧判官，文忠还朝始见知，遂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然荆公犹以为非知己也，故酬之曰‘他日倘能窥孟子，此身安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歉。（[宋]叶梦得，《避暑录话》，2003：665）

叶梦得此番话对于王安石贬多于褒，并且可以看得出叶梦得是针对王安石诗中的“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一联而有此云。叶梦得认为王安石视欧阳修为“非知己也”。叶梦得其实是指责王安石将欧阳修比作韩愈却自比孟子，诗作中自比孟子的形容对欧阳修是为不敬，认为王安石甚是狂妄。

叶梦得《避暑录话》的这段记载影响久远，而后此说更是愈发传得广泛，叶梦得提出了王安石“不敬”的看法以后，其他学者基本上皆认同。学者们对于赠诗一事的评价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认为王安石之“不敬”乃是误解欧阳修诗作中的

“吏部”为韩愈；另一类则认为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之诗，却未有表态王安石是“敬”抑或“不敬”，仅仅是反驳“吏部”为谢朓而已。叶梦得会有王安石“不敬”欧阳修之议论，乃是出于王安石自比孟子之故。然这两类学者皆未有针对此点而进行评论，相反地，学者们的评价皆将着重点置在欧阳修诗作中的“吏部”是指韩愈还是谢朓，王安石是否有所误会欧阳修诗作的方向。另有一部分学者则是认为王安石并无“不敬”欧阳修的，认为是叶梦得所言有误。

历来学者解读评价各不同，众说纷纭，吴曾于《能改斋漫录》中曰：

韩子苍言：欧阳文忠公寄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盖谓《南史》谢朓。于宋明帝朝为尚书吏部郎，长五言诗。沈约尝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文忠之意直使谢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则荆公之意，竟指吏部为退之矣。”（[宋]吴曾，2003：541）

吴曾言下之意与叶梦得相同，认为王安石对欧阳修是不敬的。吴曾更为王安石的“不敬”寻找原由，认为王安石诗作是“指吏部为退之矣”，而欧阳修诗中所指吏部其实是指《南史》谢朓。吴曾的记载乃是依据韩苍此二人所言，并收录于《能改斋漫录》中。吴开所撰的《优古堂诗话》亦与《能改斋漫录》的记载一字不漏地相同，并以韩苍之言论为基调。（[宋]吴开，2003：324）如此看来，指欧阳修诗作中“吏部”为谢朓的，确实是出自韩苍，并且学者大多都引用其说。

南宋李壁在注王安石之诗时，亦引用了韩苍所言。

河东王侑尚友，尝为予言：‘观介甫何敢望韩公之语，是犹不愿为退之，且讥文忠之喜学韩也。然荆公于退之之文，步趋俯仰，盖升其堂入其室矣。而其

言若是，岂好学者常慕其所未至而厌其所已得耶？’韩子苍言：‘欧阳文忠公寄荆公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吏部盖为南史谢朓事，而荆公答之曰：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安敢望韩公。则荆公之意竟指吏部为退之矣。

（[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827）

根据李壁所注，王安石之诗是讥讽欧阳修崇韩学。李壁此说法却又是依据王俦此人的。李壁亦依据了韩苍此人的说法，认为王安石之诗句仅仅是误解诗作中“吏部”之事而存有“不敬”之意。李壁用了此二人的说法，然此二人的说法是否可靠？二人有此言论又是以何为凭据？李壁作为注家，必定是多方阅读参考整理后，才有此之言论。李壁以此二人的说法为准则，可想而知是出于整理各家说法后，赞同此二看法，即一是王安石讥讽欧阳修之说，一是王安石乃是误解欧阳修所指“吏部”之事。李壁注王安石之诗，多方阅读以后，亦无他说，可见当朝学者们皆是认同王安石因误解欧阳修诗作中的“吏部”为韩愈而自比孟子，故对欧阳修“不敬”。

对欧阳修“不敬”之说是源于叶梦得，而历年以来学者们都已盖棺定论认为于引发这赠诗之议的主要乃王安石自比孟子之过。纵观李壁、吴曾、吴开等人的立场皆认为王安石诗作中会有“不敬”之比喻乃是出于其误解欧阳修之“吏部”之故。在这一类学者看来，王安石这“不敬”之说则还需斟酌，因误解而在答诗中自比孟子是“敬”抑或“不敬”。笔者认为这一类立场的学者，虽言王安石误解了“吏部”为韩愈，然这言论乃是出于韩苍。自宋以来，这一类立场的学者为多数，却只是盲目随从，人云亦云，学者们引用韩苍所云却未有考证其言论之可性。沈约赞誉谢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仅仅显示了谢朓作诗之优，何以欧阳修诗作中所言“吏部”

是指谢朓韩苍并未言明。故笔者认为欧阳修诗作中“吏部”为谢朓之说，理据尚是薄弱。

尽管认同韩苍所言“吏部”为谢朓的学者比例较多，却还是有少数学者是持相反立场的。据朱翌《猗觉寮杂记》中的记载：

议者谓介甫怒永叔以退之相比，介甫不知二百年事，乃南史谢朓吏部也。沈约见其诗云：‘二百年来无此诗。’以介甫为误。以予考之，欧公不必以谢比介甫，介甫不应误以为谢为韩也。孙樵《与高锡望书》曰：‘唐朝以文索士，二百年间，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欧公用此而。介甫未尝误认事也。”
（[宋]朱翌，2003：454）

《猗觉寮杂记》此番言论不但明确表示欧阳修所指吏部并非谢朓，而且也强调了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之诗作。继朱翌考察以后认为，自唐朝以来唯有韩愈造诣最高，故此欧阳修根本无需于诗中以谢朓比介甫。朱翌以唐朝孙樵一文作为凭据，可见韩愈之文于唐朝已是被承认为最高的。朱翌认为欧阳修诗作中的一联“吏部文章二百年”与孙樵《与高锡望书》中的记载，“作者数十辈，独高韩吏部”相互呼应，指的正是韩愈。（[唐]孙樵，2003：68）

再看陈鹤所撰的《耆旧续闻》中的记载：

中书待制朱公翌新仲尝言：后学读书未博，官人文字不可轻抵。……若韩文公迄今何止二百年邪？前后公诗话、至今博洽之士，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言为误。（[宋]陈鹤，2003：589）

《耆旧续闻》的评价则不同于当时普遍的说法，言王安石误会了“吏部”为韩愈一事，相反地，指责了当时大家的看法，认为大家“莫不以欧公之言为信，而荆公之言为误。”。陈鹄以中书待制朱翌的言论为基础，以孙樵换之文作为理据，换言之《耆旧续闻》是不认同此看法的。《耆旧续闻》中所言，以用事为王安石辩护，并无太多文字澄清王安石“不敬”的原由，仅仅反驳历来学者所言“吏部”为谢朓，却也难能可贵，是少数认为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之诗的学者。

清代吴景旭《历代诗话》则曰：“人徒见荆公答诗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之句，遂认吏部为韩公耳。”（[清]吴景旭，2003：555）吴景旭表示欧阳修诗作中“吏部”实指谢朓，并指责学者们见王安石的答诗为“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便将欧阳修诗作中的“吏部”视为韩愈是不对的。吴景旭亦言叶梦得是“正坐此误也”。吴景旭、陈鹄以及朱翌皆认为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之诗作，然三人都未有表达王安石是“敬”抑或“不敬”。如前所提，朱翌等人的评论更为注重反驳欧阳修诗作中的“吏部”为谢朓的看法，是赠诗评价中的第二类。笔者认为，学者们围绕于“吏部”为谢朓或是韩愈的课题，并未有帮助理清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是如何，亦未能了解究竟王安石是“敬”抑或“不敬”欧阳修。

第三类型的评论则是认为王安石并无“不敬”欧阳修。举例而言，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就有云：

欧公赠介甫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可谓极其褒美，世传介甫犹以欧公不以孔孟许之为恨，故作报诗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恐未必然也。尝读《曾子故集》，见子固《与介甫书》云：‘欧公更欲足

下少开廓其文，勿谓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但取自然。’盖荆公之文因子固而受于欧公者甚多，则知介甫归附欧公，非一日也。叶少蕴以谓荆公自期于孟子，而处欧公以韩愈，恐未必然尔。（[宋]葛立方，2003：196）

《韵语阳秋》此番话，并未有认为王安石乃是误会欧阳修所谓吏部为谢朓，相反的以撮合王安石以及欧阳修两人相识的曾巩来解说。葛立方以欧阳修早期对王安石的评论“孟韩文之高，不必似之”作为理据，指责世人多以为欧阳修不满王安石诗作中自比孟子乃是谬论。《韵语阳秋》的解读并未如其他，继承叶梦得所言并为王安石有此举作解释。《韵语阳秋》为王安石辩护并言叶梦得所云“自期以孟子，处公以为韩愈，公亦不以为歉”种种不可信。

阮阅《诗话总龟》亦有相似的记载，文曰：“而宋（当作‘谢’）景文赠文忠诗有：才如梦得今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即开门当之，二公何抑扬之异也”。（[宋]阮阅，2003：707）阮阅同样亦认为叶梦得所言有误，王安石并无“不敬”欧阳修。然，阮阅未有给予有力的凭据为王安石澄清，亦未有言明何以叶梦得之说有误。清代蔡上翔于《王荆公年谱考略》中则给予了有力凭据并认为欧阳修所言之吏部是指韩愈而非谢朓，同时亦为叶梦得有此说寻找了原由，“至如叶梦得，素好讥切荆公，此记亦徒为后来诬荆公诋毁欧阳张本，同归于无稽之言也”。（蔡上翔，1994：280-281）阮阅与蔡上翔两人皆将欧阳修与王安石赠诗一事指向叶梦得，认为叶梦得所言乃是出于其“好讥切荆公”之故，“二公何抑扬之异也”，力证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并无生嫌隙。

蔡上翔以孙樵之《与高锡望书》以及欧阳修之《记旧本韩文》为理据，认为欧阳修之诗，首言诗，次言文，诗作中所指“吏部”确实是韩愈。蔡上翔更指出，韩苍见《南史》辞句偶然相同，便强为解事而李壁注中以王侑之说为准亦不可取。王侑所说乃是谬论，何以李壁仍然记录？蔡上翔以欧阳修的诗文作为凭据展开论述，相较于前人种种的议论明显更具信服力。蔡上翔不但证明了欧阳修所言的吏部是指韩愈，亦指出了首出此议者叶梦得的言论皆是以诬蔑欧阳修与王安石为目的。蔡上翔的解读，巧妙地化解了一直以来各家对于“吏部”为谢朓抑或是韩愈的矛盾。然笔者认为蔡上翔的解读亦未完整。蔡上翔的辩证着力点主要是去寻找欧阳修之“吏部”指韩愈而非谢朓，笔者认为蔡上翔其言论虽反驳了历年以来“吏部”为谢朓的谬论，但并未有解答真正的问题所在，即王安石之作引起争议一联“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

纵观各家对于欧阳修与王安石赠诗之议论，可分为三大类型。大多学者皆承叶梦得之说，并且得出结论为王安石“不敬”欧阳修之原由乃是误解其诗作中的“吏部”为韩愈，实指谢朓。这一类的评论虽占多数，然指“吏部”为谢朓，理据薄弱，可信度不高。另一类学者则主要是反驳欧阳修之“吏部”为谢朓一事，未有言王安石之诗是否有“不敬”之意。最后一种说法，不但澄清了“吏部”为韩愈亦直指叶梦得之言不可信。笔者认为，三大类型的评价，最后一种的说法最为可靠，其中又以蔡上翔于《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考辨最为全面性，不但总结了历年来“吏部”的争执，亦道出了叶梦得与王安石之间的私怨，其言不可靠。

总的来说，历年以来学术界都众说纷纭，争论多年却一直未有真正解答王安石是否有“不敬”之处，终究是在边外说事，隔靴搔痒。蔡上翔的说法是众多学者中最为全面，可信度较高的，却也未能为王安石是“敬”抑或“不敬”。学者们的评论皆是围绕于“吏部”与叶梦得，却忽略了欧阳修与王安石“不和”之说的核心问题。笔者认为解决为何王安石自比孟子，以及欧阳修是否因为王安石自比孟子而不悦，才是问题关键所在。故此，笔者认为历来众学者对于王安石“敬”抑或“不敬”的争论皆有所误。

第二节 自比孟子之故

前节提及，历年以来学术界对于两人的诗作评论都有错误，虽后有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已推翻大家所言欧阳修“吏部”为谢朓一事，力证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之作，然却始终未解答王安石何以于诗中自比孟子，而王安石自比孟子是否是对欧阳修存有“不敬”。欧阳修与王安石相互赠诗乃是写于嘉祐元年（1056）。此年，正是欧阳修地位日隆，声名日高之时。庆历以来，正是北宋古文运动发展时期。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而王安石是有才之人，赏识王安石那是合乎情理的。欧阳修求贤若渴，据《冷斋夜话》的记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诵孔北海‘座上客常满，樽中杯不空’**”。（[宋]释惠洪，2003：244）欧阳修一生都乐于延誉赏荐人才，与王安石于嘉祐元年（1056）的会面，两人相处愉快，而后更赠诗于王安石表达了其对王安石的赏识。

欧阳修所作的《赠王介甫》诗中“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以韩愈表示王安石文造诣高。欧阳修诗作中提及韩愈并无不可，正如蔡上翔所言：“**欧阳修诗好李白、文宗韩昌黎**”，（蔡上翔，1994：280）又如苏轼于《居士集叙》中所言：“**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贄，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1986：316）欧阳修以李白韩愈称誉王安石，其实是表达了其对王安石之器重，也表达了其爱才纳贤之意。嘉祐时期欧阳修渴贤亦能从《再论水灾状》可见。欧阳修于《再论水灾状》一文中，推荐了包拯、张瓌、吕公著、王安石四贤，文中更称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议论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1662）茅坤评此文时更曰：“**因水灾议及用贤，亦探本之论。**”（[明]茅坤编，高海夫主编，1998：1727）欧阳修由外镇还朝后，其求贤之意显而见之。

再言，欧阳修崇韩愈于其《记旧本韩文后》一文中已有所言。据吉川幸次郎所言，欧阳修赠诗于王安石其实是别有用心的。欧阳修对于王安石是期以可以协助鼓吹古文运动，成为其继承者的。（吉川幸次郎、李庆，1987：72）《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博士论文中亦有言：“**欧阳修对门生后学的大力奖掖或是他有意识地学习韩愈之必然效果。**”，（陈湘琳，2010：37）正如唐代韩愈，欧阳修喜掖后辈极有可能是为了其古文运动的成功。庆历三年（1043），欧阳修已有称誉王安石之作。然真正促使欧阳修不断提拔王安石的，是庆历四年（1044）曾巩携带王安石之文于欧阳修之时。曾巩除了上书于欧阳修之外，亦有书于蔡襄，内容几乎与《上

欧阳舍人书》相似。可见曾巩积极将王安石推荐于文坛前辈乃是出于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称文”之故。

仁宗时期正是宋代古文运动蓬勃发展时期，尤其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努力下，古文运动已有一定的成果。欧阳修赏识的是王安石之文，见了王安石之文以后，欧阳修不但期许两人可以会面，还给予评语于王安石。嘉祐时期的王安石则名声刚起，并且与朝中多位名臣皆有往来。王安石除了深得欧阳修器重以外，亦得多位重臣赏识，是欧阳修心目中继承其古文运动的最佳人选。故此嘉祐元年（1056），两人相见时，欧阳修以诗称誉王安石。细阅欧阳修之诗便不难发现欧阳修对王安石是有期许的。欧阳修希望王安石能协助鼓吹古文运动，成为其接班人，欧阳修诗中一联：“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已是言明其意，并认为王安石领导文坛是指日可待的。

欧阳修非常赏识王安石诗歌，欧阳修不止一次称誉了其诗作。《赠王介甫》诗其中的“翰林风月三千首”已有所示，指的是王安石之诗，故“吏部文章二百年”所指应是散文，如蔡上翔所云，首言诗，次言文，而诗中的“吏部”必是韩愈而非谢朓。蔡上翔的论点笔者甚是认同。王安石是个聪慧的文士，必也看出诗中欧阳修对其的抱负。故王安石回赠欧阳修诗中有“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一句。王安石曾对好友曾巩言其对欧阳修之倾慕，王安石虽年轻气盛，然两人并未有任何争执与矛盾，相信不会对倾慕已久的欧阳修出言不逊。何况，欧阳修于嘉祐三年（1058）曾与王安石书信并言“**自拜别，无日不瞻企**”，（[宋]欧阳修撰，李逸

安点校，2001：2368）王安石之诗若有讽刺欧阳修，欧阳修与王安石书简来往何以会言其对王安石之思念，这足以验证了，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未受诗作影响。

王安石诗作中一联“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自期以孟子而以韩愈比欧阳修，亦正是此联而引发了王安石狂傲大有“不敬”欧阳修之议论。笔者认为，王安石将欧阳修比为韩愈乃是合情合理的。如前所提，嘉祐年间的欧阳修扛着“诗文革新”的大旗，大有唐朝韩愈之势，而欧阳修亦有以韩愈自比之意。《后山谈丛》中就有这么一段记载：

韩魏公屡荐欧阳公，而仁宗不用，他日复荐之，曰：‘韩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为相，而竟不用。使愈为之，未必有补于唐，而谈者至今以为谤。欧阳修，今之韩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后人如唐谤必及国，不特臣辈而已。陛下何惜不一试之，以晓天下后世也。’上从之。（[宋]陈师道，2007：50）

韩琦乃当时朝廷重臣，“欧阳修今之韩愈也”此番话出自韩琦与宋仁宗的对话中，可见这样的评价于当时已是相当普及。

员兴宗《九华集》亦有记载：“至和、嘉祐间，欧阳子永叔以古文章名天下，士率曰：‘今之韩愈’，而欧亦规愈自名者。”（[宋]员兴宗，2006：200）如此看来，欧阳修乃是“宋代之韩愈”的称呼除了是大家公认以外，欧阳修其自身亦是承认的。故，王安石于诗作中将欧阳修比作韩愈并无任何不妥之处。然，王安石将自己比作孟子又是何故？王安石自青年时期起就苦读诸子百家之书，对儒家经典尤为用心，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庆历二年（1042）王安石登进士，初入仕途，至扬州为官并

结识了孙侔。孙侔一生仰慕孟子、韩愈道德文章，行古之道，又善古文。王安石作《送孙正之序》于孙侔，文中王安石明确表达了其倾慕孟轲、韩愈。

时乎杨、墨，已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已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时胜道也。（王水照、高克勤编撰，1997：2）

《送孙正之序》是王安石较早的作品，可见年仅二十二岁的王安石对于孟子的崇拜。王安石在未为官之时，对孔孟思想已有阅读，为官之后，更是追求孟子的境界，期许自己可以以天下为己用。

再细读王安石其他作品当中谈论孟子抑或是以孟子为例的文章亦有不少。其中由庆历时期一直至嘉祐元年（1056）的就有《答段缝书》、《与祖择之书》、《上人书》等篇文章论及孟子。¹¹由此可见王安石对于孟学是颇有研究的，故此才会于文章中反复称引孟子话语。王安石之《奉酬永叔见赠》一诗相信并无任何讥讽欧阳修或是自抬之意。此诗作于欧阳修以及王安石初次见面之时，王安石为官时日尚短，于政治、学术上的影响力是不能与欧阳修相比的。结合王安石早期作品分析的话，诗作中“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一联，相信是出于王安石对孟学的崇拜。此联不但显示了王安石谦虚的态度，亦说明了王安石其政治抱负。

庆历年间，曾巩持王安石之文于欧阳修，欧阳修对其文的评语是“**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1984：254-255）如此看来，王安石之文与孟、韩之文是相似的，欧阳修方给予此评语。这亦可证明王安石对于韩愈、孟子之文也是极为欣赏的。欧阳修对

王安石的赏识早在庆历两人尚未见面之时已有。欧阳修更已是数次向朝廷推举王安石，而王安石拒绝欧阳修亦已有数次。嘉祐元年（1056）两人相见赠诗，王安石必是读懂了欧阳修之诗，而回拒欧阳修。王安石拒绝欧阳修之意并非首次，故此笔者认为欧阳修并不会因此而感不悦，王安石之诗亦无讥讽欧阳修之意存在的。王安石诗作中“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一联，只是表达了王安石欲以孟子道义自任，只要能窥探到孟子的境界王安石就满足了，又岂敢高攀达到韩公的境界“以文明道”呢？句意甚明，王安石借诗委婉地拒绝了欧阳修继承诗文革新。

王安石之文《上欧阳永叔书二》是最能体现王安石对欧阳修赠诗的态度。文曰：

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下亲屈势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乐与之为善。……过蒙奖引，追赐诗书，言高旨远，足以为学者师法。惟褒被过分，非先进大人所宜施于后进之不肖，岂所谓诱之欲其至于是乎！虽然圣德之贶，非敢言诗也。（〔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1279）

王安石于《上欧阳永叔书二》中为自己澄清，请求欧阳修可以谅解。阅此文以后，可以得知王安石并无“不敬”欧阳修，诗作仅是表达了其谦虚态度以及政治抱负。王安石所言“孟子”与“韩愈”在其眼中的位置高低。王安石诗作中以韩愈比欧阳修并无不可，然王安石却言“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这意味着于王安石心中孟子与韩愈是有差异的。

韩愈《答侯生问〈论语〉书》里有道：“**圣人践形之说，孟子详于其书，当终始究之……践形之道无他，诚是也。**”（[唐]韩愈撰，屈守元主编，1996：2760）笔者认为王安石推崇孟子，认为孟子与韩愈是有高低之分，与韩愈此番言论是有关的。王安石在其《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曾公立书》等文章多次提及孟子的为政思想，可见王安石着重的是孟子为政方面的思想。ⁱⁱⁱ由此可见，孟子在王安石心中是其于政坛上的追求。欧阳修的赠诗表达了其欲王安石协助鼓吹古文运动，王安石于答诗中以孟子自比，恰恰是反映了其不敢高攀领导文坛之意，王安石所着重的是于政坛上的成就。再言，王安石任群牧判官前后有两年时间，期间王安石就曾请求外任达十多次。王安石为何一再求离京任地方官呢？王安石与他人不同，他非常有理想，踏入仕途并非图优厚的官职。王安石与其《答钱公辅学士书》中就曾提及，士之出，重要的是行道，苟不能行道，虽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亦适足使父母羞。（[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1287）

笔者认为王安石于诗中自比孟子并无任何自抬之意，故言王安石狂傲自大的说法并不成立。王安石自比孟子的原因主要是表达其政坛上的追求，王安石并无“不敬”之意。王安石自比孟子，犹如欧阳修自比韩愈，是崇拜之情。何况，欧阳修本人对于孟子同样亦是推崇的，苏轼序欧阳修《居士集》亦有言：“**其学推韩愈、孟子以达至孔氏**”，可见欧阳修对于孟子的学说是有所了解的。（[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1986：316）继赠诗事件之后，王安石仍旧出现于欧阳修所办活动中，可见无论是欧阳修抑或是王安石两人皆未有因此事可生嫌隙，欧阳修更无因王安石自比孟子而有不悦。王安石于嘉祐元年（1056）以后，不但作了《上欧阳永叔书》三

篇，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更有书简于吕慧卿推荐王安石。两人赠诗一事以后，欧阳修依然赞誉王安石诗作，两人的关系尚是融洽，并非如后世学者所言“不和”。

总括而言，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相互赠诗之议乃是后人过分解读之故，另言王安石狂傲自大之说，其实只是王安石委婉向欧阳修表明心意。王安石并无误解欧阳修诗作中“吏部”为谢朓，而欧阳修也没误读王安石之诗，明确了解王安石志向所在。欧阳修与王安石在两人会面以后，藉由诗作对彼此的认识可谓更为深入，两人本是相互倾慕却无法见面细细长谈一直至两人见面以后，两人的关系更是跨进一步。故此，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关系是良好的，并未有因赠诗一事而受影响断绝往来。

第四章 唱和之作——《明妃曲》

嘉祐二年（1057），王安石请得外任，就任常州知州。王安石一到常州，即开始视事。王安石并不像一般文士，以当地方官为无出息，而是将地方官视之为实现其惠利百姓理想的最好机会。嘉祐二年（1057）以前，王安石在欧阳修于朝廷的推举下，便入京当官。嘉祐元年（1056）在欧阳修劝谕下王安石方才任群牧判官一职。王安石在任群牧判官一职期间，曾请求外任，且次数高达十多次。王安石一再要求离京任地方官，所用理由不外乎是亲老家贫，难住京师。然，外任的待遇不必京师，王安石屡言亲老家贫，其实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王安石于京师任职期间，一直都不安心，阅其此期间所作的诗便可发现王安石痛苦的心情。

王安石迫切希望自己有所作为，以至于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亦不忘访问民间疾苦。王安石提点江东刑狱任满以后，被召还京师。同年，王安石亦作《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言天下事，提出了改革要求。

臣愚不肖，蒙恩备使一路，今又蒙恩召还阙廷，有所任属，而当以使事归报陛下。不自知其无以称职，而敢缘使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详思而择其中，幸甚。（[宋]王安石撰，秦克、巩军标点，1999：1）

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是王安石于外任期间有感而发，深感宋朝需改革。此文虽未有被采纳，然王安石却透过此文展现了其政治抱负。

嘉祐年间王安石除了有《上仁宗皇帝万言书》轰动一时以外，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亦作了两首诗《明妃曲》引来极大的回响。王安石作《明妃曲》

距离《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仅相隔数月，故此有学者认为王安石之《明妃曲》其实是表达了其于政治上的感受。王安石之诗“语出惊人”，相较于宋以前的《明妃曲》更为出色，然亦有学者认王安石之“语出惊人”而给予不好的评语。《明妃曲》一出即得朝中多位重臣唱和，其中欧阳修更是和了两首之多。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可谓是历代咏昭君诗作中的名篇。诗曰：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141）

另一诗则曰：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141）

王安石此二诗除了轰动当时文坛亦备受后人关注，引起后世学者多番议论。因此本章将会分为两节，剖析王安石所作《明妃曲》之独特之处，探讨王安石《明妃曲》标新立异之余，包含着其怎样的感慨，同时亦将王安石之《明妃曲》所引来的争论一一讨论，并且探讨欧阳修是否认同王安石，两人的关系是否良好。

第一节 创新中的感慨

历年以来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诗作甚多。昭君出塞一事最始可见于《汉书·匈奴传》：

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单于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汉〕班固撰，颜师古注，1962：3803）

这是正史中对于王昭君的记载。王昭君出塞一事，而后于《西京杂记》加以描绘以后，使昭君故事更为精彩。葛洪《西京杂记》中加入了后来大家都熟悉的关于毛延寿的内容。《西京杂记》的昭君故事激起了文人们的情感，成为了文人诗歌一咏再咏的题材。从正史记载以及民间传说中的形容，昭君是一个具有美貌又不失坚强的女子。昭君的形象亦因此而超越了其自身所代表的历史事件，成为文人抒发情感的典故。

历代昭君诗歌似乎都离不开叙述元帝的昏庸、画工的贪婪、昭君的悲惨。诗人们无论如何翻新斗奇，标新立异，终究难以跳出以下两种模式：一是肯定昭君出塞的合理性，一是对这一悲剧加以谴责否定。自晋以来，文人对以昭君为题材的作品就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唐以前的昭君诗并不及唐宋两代多。现存最早是晋代石崇的《王昭君辞》，此诗描写了昭君远嫁匈奴的经历，以及其于匈奴遭受凌辱，虽生犹死的绝望。作者于诗作中所形容的昭君出塞的悲哀。（逯钦立，1988：642）六朝时期，鲍照、沈约、何逊等人同样亦作了类似的诗作，格调同样是哀怨的。当

然也有部分昭君诗试图叙述昭君悲剧的原故，然相较于后代的昭君诗，晋代六朝的昭君诗依然是狭窄的。（吴宝明、高升，2009：185）

到了唐代，昭君出塞依然是文士们热门的题材且范围更进一步扩大，昭君诗的数量大增。翻阅《全唐诗》，唐人所作昭君诗中，单是以《王昭君》、《昭君怨》、《昭君辞》为题的诗篇就有数十首，就以唐代著名诗人来说，李白、白居易、上官仪、李贺、李商隐等人皆有作品。唐代部分昭君诗不再描写昭君拥有美貌却不得宠的悲哀，相反地诗人多以昭君的遭遇联想自己，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表达了对国家、对亲人的眷恋。（殷康焕，2008：21-23）举例而言，杜甫《咏怀古迹》一诗，借昭君吟咏，写昭君不幸的一生也抒发了杜甫的政治怀抱及其忠君恋阙之情。

（彭定求，1960：2511）唐代诗人们都大多都如杜甫，通过昭君来寄托抒发内心的情感。可见唐代的昭君诗已经不再是对昭君出塞这事件简单叙述。

及至北宋，文人们赋予王昭君全新的形象，一反前人所吟咏的悲怜女子。宋朝的昭君诗相较于唐代的昭君诗，多了一层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宋朝文人对于昭君角色深感认同，文人对昭君命运的感叹的同时，多少皆有隐射自身命运。另，宋代诗人倾向于将历史、政治、伦理的思考融入其中。（唐眉江，2003：8-12）宋代昭君诗的创新，其中又以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中最能显现。与之前的昭君诗相比，王安石的《明妃曲》不再描写昭君的悲惨遭遇，而是从昭君的故事中引申出一个有别于他人的诠释。

王安石以虚实并举的手法刻画了王昭君的形象。诗句中的“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更是一反前人所见，为收受贿赂的画工毛延寿辩言。王安石《明

妃曲》的题材是以《西京杂记》里说记载的故事为本的而非正史的，这一点与前人无异。然王安石于诗作中大胆地也为画工毛延寿翻案，这是有别与前人的叙述。前人多认为造成昭君悲剧命运的是画工毛延寿，汉元帝杀毛延寿乃是大快人心之事，王安石却言毛延寿是“枉杀”。王昭君在王安石的刻画下不再是一个历史的牺牲者而是一位勇于为国解难的女英雄。王昭君这样的形象亦是颠覆传统昭君诗一直以来弱者的形象。^{iv}

在王安石看来，人的神采是画不出来的，昭君之美更是无法由毛延寿笔下传达的。据《西京杂记》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贿画工，多者十千万，少者亦不减百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葛洪撰，曹海东注译，1984：55）而故事后续发展则是汉元帝因未能宠幸昭君而将毛延寿等画工杀了。历代以来，文人们都认为毛延寿该杀，就如崔辅国《昭君诗》所云：“何时得见汉朝使，为妾传书斩画师。”（彭定求，1960：1205）王安石却提出了其独特见解，为毛延寿辩解。

按高步瀛于《唐宋诗举要》曰：“介甫此诗却无此失”，（高步瀛，1959：329）王安石不但为毛延寿辩解，同时亦认为导致昭君悲剧的乃是汉元帝，汉元帝单凭画像召幸后宫，此法不当。画工要将外貌真实地画出已是非常艰难，更何况人的内在美是无法以任何形式表现出来的。王安石认为昭君一事，汉元帝不该怪罪画工毛延寿，相反地汉元帝应在得知昭君一事以后，自我反省，深入调查。王安石大胆地为毛延寿翻案，提出了毛延寿之冤，是历年昭君诗中所未有的。

此外，王安石在第一首诗中用了汉武帝幽闭陈皇后的典故，表示了昭君悲剧命运的根源，“君不见咫尺闭门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陈皇后曾备受宠幸却也落得悲怜下场，打入冷宫。陈皇后与皇帝近在咫尺却再也无法见上一面。王安石认为昭君之所以会有悲剧的命运其根源乃是其“入汉宫”之时，而非“出汉宫”之时。王安石先是叙述君王眼里昭君的动人，“入眼平生几曾有”而使“君王不自持”。王安石继而叙述昭君出塞后的情形。“一去心知去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显示了昭君自知已无希望可归汉宫，却仍然不改汉服。王安石叙述了昭君出塞后年年不忘询问塞南之事，着重突显了昭君不忘故国，不忘亲人之心情。王安石将昭君于匈奴思汉思乡的深情与失望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二首诗作王安石则着重写昭君的塞外生活。全诗以琵琶为主轴，从昭君出塞以后写到昭君逝世的情景。诗开始王安石即以“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一句写昭君之事，巧妙地运用了《诗经》中“之子于归，百两御之”的意义。（程俊英、蒋建元著，1991：15）王安石紧接着深入地描绘了昭君陷身与匈奴后的孤独情况。“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一联王安石就叙述了昭君初嫁时的满腹悲怨无处可诉，唯有寄情于琵琶。昭君手弹琵琶“劝胡酒”，却眼看“飞鸿”心向“塞南”，其内心的痛苦可见而知。而后王安石却笔锋一转写“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写昭君心事唯有汉宫女知道，却不敢安慰昭君，昭君只能暗暗垂泪。王安石更借“沙上行人”之口劝诫昭君胡恩深重。结尾诗句更为精彩，“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不但写出了昭君不在人世，而其青冢也早已荒芜，留下的仅仅是为昭君出塞所弹奏的悲哀曲子而已。

王安石于其第二首诗作中，亦有有别于前人之处。王安石认为昭君出塞其实不是件悲哀之事。王安石认为昭君出塞是值得庆幸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写昭君的出塞远比留在汉宫更好，汉朝皇帝的恩浅而胡人恩深。王安石如此独特新颖的说法是前人所未有。王安石认为，昭君在匈奴深得单于疼爱，犹如重获新生。昭君的遭遇相较于第一首诗作中陈皇后的深居冷宫的下场，王安石认为昭君出塞更是一个好的选择。昭君虽远嫁胡人之处，却得到了留在汉宫人儿所期待的幸福。据《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南朝]范晔撰，李贤注，2009：2941）《后汉书》寥寥几字，已将昭君未远嫁胡塞之苦详明。如此一来，王安石如此大胆地说辞亦非谬言。

一直以来，昭君诗里昭君的形象都是出塞远嫁的可怜儿，王安石打破了这种传统形象，刻画了昭君乐得知心人的情形。王安石认为昭君并不可怜，昭君出塞得知心人，虽有思乡思汉之情，却也让昭君免于受冷宫之苦。尾联王安石则写昭君逝世已久，其青冢都已荒芜，然昭君那哀怨的曲子广泛流传，昭君的故事以及那哀怨的曲子不曾终止。王安石此《明妃曲》虽花了许多笔墨描述昭君的哀怨、悲痛，然王安石却也为昭君出塞一事给予了新的评价。同为昭君诗，前人仅仅在写昭君之美、昭君之怨，王安石却能立意标新，令昭君的形象更为鲜明。

王安石的《明妃曲》作于嘉祐四年（1059），部分学者认为《明妃曲》的创作大约与此前王安石上万言书一事有关。《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深思熟虑以后所写的，文章针对了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提出了改良方法，体现了王安石高远的抱负以及体恤人民的品德。然王安石的万言书并未有引起仁宗的注意使王

安石极度失落。王安石深感自己怀才不遇，创作《明妃曲》以后的两年，屡屡辞官。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二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亥的记载：

度支判官、直秘阁判度支勾院司马光，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直集贤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辞而后受，安石终辞之。最后有旨，令纪门吏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随而拜之，安石避于厕，吏置敕案而去，安石遣人追还之。

（[宋]李焘，1986：4652）

由此可见，王安石其落寞的心情以及其对君臣遇合贵在心心的认知。嘉祐五年（1060）以及嘉祐六年（1061）王安石辞官相较于嘉祐初期的更为坚持。故此，王安石的《明妃曲》所强调的“知心”极有可能是在隐射自身怀才不遇之苦。

王安石于诗作隐射自身怀才不遇的说法，笔者甚是认同。《明妃曲》两首诗作中的“君不见咫尺闭门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不但“语出惊人”而且还是《明妃曲》轰动文坛最主要的元素。

《明妃曲》中王安石为毛延寿辩护指责元帝，亦是《明妃曲》独特之处。然这样的叙述，却也让后世学者认为王安石是别有用意。王安石的《明妃曲》虽标新立异，然结合王安石当时所处环境，《明妃曲》标新立异之处，似乎亦有表达自身不得仁宗赏识的郁闷。

再阅同时期王安石其他的诗作，王安石皆是强调“知心”。嘉祐四年（1059）王令逝世。王安石与王令是忘年之交，感情深厚，王令的离去，王安石悲痛不已，作了《思王逢原》、《思王逢原三首》等诗歌。其中的诗句诸如“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等，虽是言了解自己的知己逝

世，然这当中亦含有了王安石不得权者赏识之痛。⁹从历代昭君诗歌的演变来看，王安石的《明妃曲》无疑是标新立异，不再局限于昭君或视昭君为吟咏抒情的对象，而是将昭君作为议论的题材。然王安石借由昭君一事抒发情感，此点却是与唐代昭君诗无异。

总的来说，王安石的《明妃曲》能标新立异，提出了有别于前人的意见，引人深思，为昭君诗创新，打破了历来昭君诗的格调。两首《明妃曲》的意义以及艺术手法皆属优秀，是众多昭君诗中的最为出类拔萃的。虽然《明妃曲》引来了王安石在同情昭君命运、讽刺元帝不识人的同时，亦寄寓了自己人生感慨的说法，然笔者认为诗人藉由诗作抒发情感乃是无可厚非的。尽管此点显示了王安石与唐代昭君诗无异，然笔者认为诗歌是文人的语言，正所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人于诗作中抒发情感是普遍的事情。故此，王安石的《明妃曲》可以说是创新中亦包括了自身的感慨。

第二节 《明妃曲》之论

前节提及，王安石所作《明妃曲》当中包含了其个人的感慨，即王安石不得仁宗赏识一事。王安石于诗作中表达了其对“知心”的重要性，诗作中的“君不见咫尺闭门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以及“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虽有创新之处却也隐射了才士不遇的苦闷。《明妃曲》是王安石的著名诗篇。王安石的《明妃曲》不落陈俗，不但为昭君塑造了爱国的形象，一反长久以来昭君悲惨命运的看法，更是大胆地为画师毛延寿翻案，两首诗作皆提出了前无古人的意见。

在王安石以前，歌咏王昭君的诗篇多不胜举，更不乏有佳作。然，王安石之《明妃曲》却是影响深远，后世亦不断议论。引起大家所议论的，正是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特色——那有别于前人的想法，尤其是其第二首诗作中一联“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历年以来议论最多。王安石之《明妃曲》一出，即得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唱和，这说明王安石这两首《明妃曲》无论是思想抑或是艺术手法都使他们钦佩。故此，究竟历来学者们因何而起争论，学者们所争论的又是否影响欧阳修与王安石的关系，将是本节所要探讨的。

李壁《王荆公诗笺注》于第一首诗作中注云：

山谷跋公此诗云：荆公作此篇，可与李翰林、王右垂并驱争先矣。往岁道出颖阴，得见王深父先生，最承教爱，因语及王荆公此诗，庭坚以为‘词意深尽，无遗憾矣。’深父独曰：‘不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人生失意无南北，非是。’庭坚曰：‘先生发此佳音，可谓极忠孝矣，然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恐王先生未为失也。’明日，深父见舅氏李公曰：‘黄先生宜择明师畏友与居，年少而持论知古血脉，未可量也。’（[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141-142）

李壁所注中，王回与山谷谈及《明妃曲》时称山谷“年少”。依据此资料，《明妃曲》在初期就已引起了争论，正如资料显示引起争论的是王安石诗中所言“人生失意无南北”。故此可知评论距离王安石完成此作未久也。就此看来，此为《明妃曲》首章所受到的最早一次评论，而此评论亦是少数对王安石第一首《明妃曲》的评语。

王安石第二首诗作，其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是遭受非议最多，其中有者认为王安石所言不合常理并且罔顾节义；有者则认为学者断章取义，误解王安石之诗。此联的争论自宋以来不曾停止，众说纷纭。李壁注王安石此诗作时曰：

范冲对高宗尝云：‘臣尝于语言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沧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身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胡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头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孟子曰：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以胡虏有恩而遂忘君父，非禽兽而何！’荆公语意固非，然诗人一时务为新奇，求出前所未道，而不知其言之失也。然范公博致亦深矣！（[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142-143）

李壁的记载所叙乃是范冲与宋高宗之间的对话。李壁作注时特别将此段资料记下，可见李壁是认同范冲所言。李壁认为王安石《明妃曲》二首诗篇虽写得好轰动文坛一时，却也为求有“背君父之恩”的过错。

范冲是始终参与司马光《资治通鉴》编纂工作范祖禹的儿子。笔者认为范冲对于王安石的评语是不可取的，一是因为范冲基于政治立场并无法客观公正对王安石之诗作给予评价，二是范冲所言乃是断章取义，冲着王安石“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句而发表的。范冲有此言论，并不是以诗文的艺术特色角度来评价。范冲所言已是牵扯至政治上的问题了。

对于王安石诗作有异议不仅仅是范冲一人而已。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亦载：“若如此诗用意，则李陵偷生异域不为犯名教，汉武诛其家为滥刑矣。”（[宋]朱弁，2003：25）朱弁的言论明显的亦是冲着“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朱弁的说法来源主要以是范冲之说为基础。范冲之言论虽不可信，然朱弁却是赞成范冲所言，认为王安石“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是对汉朝不忠之言论。

从以上种种资料来看，后世学者阅此诗作时，针对其“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一联而有异议，蔡上翔虽有替王安石辩护，却也不见高明。蔡上翔言：

昔韩昌黎谓：‘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是虽为古书言之，然尤可通之训诂。彼晓晓之议此诗者，祇缘未识‘恩’之一字耳。夫‘恩’之为言，犹‘爱幸’之辞云而。明妃处汉宫，数岁未得见御，是爱幸之所未及者，曰汉恩自浅可也。单于喜得明妃，其恩自深，亦就其爱幸之私言之。（蔡上翔，1994：331）

蔡上翔将诗作中的“恩”解读为男女关系。虽然蔡上翔如此可为王安石辩护诗作中王安石并无不忠于汉朝，亦无为“语出惊人”而用语不当这，然如此一来，则忽略了王安石创作《明妃曲》时前后的心态。笔者认为蔡上翔并没有真正为王安石《明妃曲》澄清，况且蔡上翔解释“恩”乃是“爱幸”，是男女关系之“恩”，同样地这亦可是君臣关系之“恩”。故此，笔者认为这样的辩护并不高明。

“汉恩自浅胡自深”一联有微言，笔者认为那是因为宋朝自建国以来，始终面临着辽、金、西夏等的压力。仁宗时期，于宝元二年（1039）至庆历四年

(1044)就有长达六年的宋、夏战争。战争中，宋军皆胜少败多。（张祥浩，2006：25）南宋更是面临金、西夏、蒙元几国的外患。学者们对于夷狄多有不良印象且国家因夷狄多有战事，更使宋朝学者对于王安石诗作中的“汉恩自浅胡自深”一联不满。学者们的不满乃是出于政治立场，然王安石有此联并不代表王安石“不忠”于宋朝，正是王安石心系于宋朝，故此而《上仁宗皇帝万言书》。

王安石于《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有言：“**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宋]王安石撰，秦克、巩军标点，1999：1）王安石长期任地方官一职，亲眼目睹人民疾苦，认识到宋朝所面临的危机而上万言书，然其万言书却不得回应。学者们因“汉恩自浅胡自深”一联，而言王安石“无君无父”。然考究王安石生平，王安石极有抱负，于仕途上欲有所表现，这样的心态下若言王安石“无君无父”似有不妥，亦欠缺理据。再言，笔者认为王安石于诗作所要强调的乃是“知心”，并非学者所言“背君父之恩”，《宋诗精华录》中亦评曰：“**二诗，荆公自己写照之最显者**”。（陈衍编、秦克整理集评，2008：42）王安石不得仁宗赏识却又急于有所政绩，因此于诗作中抒发其情感。王安石深感怀才不遇，又见宋朝弊病甚多，其上万言书，表现的正是其爱国之情，护君之切。历来学者们只因诗作中的一联，而言王安石不忠忘恩，则未免显得武断不公了。

以作品来剖析，《明妃曲》的艺术性之高，细读全诗即可发现，王安石有意将昭君于汉宫以及胡虏作为对比，若诗作并无胡汉之分，全诗的意境则有欠也。再谈，王安石诗作主要乃是叙述昭君离开祖国，背井离乡之情，且看王安石前篇已是细细道出昭君之悲痛，就可得知。王安石“汉恩自浅胡自深”一联，是谓昭君在汉

宫时未得见龙，胡自深则指远嫁匈奴得到了单于的爱。此联虽看似汉胡恩高而汉恩低，然王安石于诗作中已有营造昭君悲怨之情，这胡恩高汉恩浅，不就更为凸显昭君之悲怨吗？以笔者看来，此联王安石是以沙上行人之口吻而写，劝诫昭君莫再悲哀。如此一来，全诗一气呵成，亦较为合理。

欧阳修阅王安石之作以后，叹服其吟史怀古的意蕴和远非时人可比的叙述，特意和了两首《明妃曲》。其一曰：

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2009：231）

另一诗《再和明妃曲》则曰：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2009：231）

除了欧阳修以外，和王安石《明妃曲》的还有刘敞的《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司马光的《和介甫明妃曲》以及梅尧臣的《和姐夫明妃曲》。王安石所作《明妃曲》可谓引起文士热烈反响。众多唱和之作中又数欧阳修之作最为精辟。

王安石之《明妃曲》二首一出，就得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曾巩等人的唱和，可见其诗造诣之高。王安石于《明妃曲》中强调了“知心”，而欧阳修与王安石于诗文上的关系早至庆历时期缔结，欧阳修与王安石又是否相知呢？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作《明妃曲》，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非但感情深厚，且已会面更不时有聚会，两人应是相知心的。笔者以为，王安石之作若真如后世学者所言，对汉有不忠之情，背君父之恩，何以此二首诗篇一出，即得各个文人唱和呢？其中欧阳修作为文坛领袖竟也和了二首之多。欧阳修本人对其和诗也颇自喜。

先公平生未尝夸大其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柴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也。（[宋]叶梦得，2003：1000）

《石林诗话》记载了欧阳修自言平生有诗三首最得意，而其所和《明妃曲》就在其中。叶梦得更言：“今阅公诗者，盖未尝独异此三篇”。（[宋]叶梦得，2003：1000）可见欧阳修虽是和王安石之诗，却对自身所作之诗甚是满意。

首诗，欧阳修以草原大漠为背景衬托王昭君艺高曲美的琵琶旋律。欧阳修如此的叙述更是显得昭君之心情。其中“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一句，读之更是引人悲痛。欧阳修不但刻画了昭君的内心心情，也写出了昭君对于历史的贡献。欧阳修则是写明妃流落之苦。欧阳修以“汉女嫁胡儿”一句紧扣明妃，而后又言此女子乃貌如玉。欧阳修又写明妃嫁到“风沙无情”的胡地，身处无中国人之处，唯有以曲子驱赶心中之愁。欧阳修为突出明妃流落胡地之苦，以“推手为琵却手琶”承接上文，哀愁的琵琶声使胡人都“咨嗟”了。明妃哀愁的琵琶声“传至汉

家”后，非但没有引起同族的悲悯之心，反而成为了汉宫中争着演奏的“新声谱”。

vi

第二首诗作同样的亦是借由昭君之事写出令人反思的宋代。前句“汉宫有佳人”紧扣明妃，而佳人亦是“绝色天下无”的。下一句“天子初未识”则写出了明妃与君王之间的故事。欧阳修此诗的题材亦是以《西京杂记》为本的。欧阳修而后写了昭君被迫嫁至胡地。据《西京杂记》里的故事，昭君嫁到胡地乃是画工毛延寿之过。此诗作中，欧阳修并无如王安石那样为毛延寿翻案辩护，却也是将这过错矛头指向君王的，“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表达了杀了毛延寿亦无法挽救昭君其悲哀的命运。而后一句“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更使人深思，此诗句不但批判了汉君王，也为后句“汉计诚已拙”埋下伏笔。^{vii}

以笔者来看，欧阳修与王安石是相知的。欧阳修所和之诗作，与王安石有异曲同工之处。欧阳修之受篇诗作，言及明妃之曲成为了汉宫中相争演奏的新曲，不但写出了明妃之悲哀，亦显现了汉宫之无情。另一篇诗作，欧阳修更是直指元帝虽斩杀了画工毛延寿，然昭君已出塞，这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欧阳修更言“万里安能制夷狄”，这与王安石之作“汉恩自浅胡自深”的用意皆相去不远。欧阳修的两篇诗作都展现了其对王安石之心情感慨的了解。王安石于诗作中抒发了其怀才不遇，不得仁宗“知心”的郁闷，而欧阳修之诗作，似乎亦有仿王安石之诗意，强调了皇帝之昏庸，其中“万里安能制夷狄”的质疑，与王安石所上万言书中的“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相互呼应。

欧阳修在其一生的仕官生涯中，皆以社稷为重，居安思危，这一点与王安石相同。欧阳修于朝廷上，亦曾提出若干革弊救时的方案。面对宋朝与西夏的战事，欧阳修曾言：“窃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北，绝无处置”，明显地对于宋朝一味买静求安，习于苟且，感到不满。（[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1517）欧阳修同样亦看到宋朝的弊病，守旧、怠惰、驰慢等。欧阳修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这一点与王安石不谋而合。如此看来，王安石之心情，欧阳修是可以体谅了解的。为此，欧阳修不但唱和王安石之诗作，同时诗作字里行间亦有支持王安石观点的隐喻存在。

总的来说，王安石之《明妃曲》二首，虽引来了不少争议，言及王安石背君父之恩，然其二篇诗作皆是历来昭君诗中影响最深的。王安石于诗作中即有创新之处，同时亦含括了自身不得仁宗“知心”的感慨。尽管如此，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却是相知的。历来学者对王安石《明妃曲》的种种议论，并未有影响欧阳修与其的友谊，相反地，从欧阳修所和之诗中，可以看出欧阳修身同感受。故，《明妃曲》的唱和是两人彼此相知之作，两人的感情亦非常融洽。

结论

本论文的研究范围与目的，主要是探讨与分析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嘉祐时期的关系是否融洽，以及历来学者言及两人之间“不和”的种种理据与原因。综合上述所言，笔者在此论文中已对上述所提出的研究范围作了种种分析与整理。

通过本论文的分析，可发现欧阳修与王安石于嘉祐元年（1056）至嘉祐四年（1059）之间的“不和”之说皆与诗文有关。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之间的“不和”乃是后世学者误解所致。首先，历年以来学者们皆言欧阳修与王安石的结识乃是曾巩从中积极引荐之故。然笔者认为欧阳修与王安石自庆历年间起就已透过阅读彼此的诗文而产生倾慕之情，两人的结识始于诗文，这是一种诗文关系。两人的关系在彼此不知觉中就已缔结，而曾巩在两人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辅助并不大，仅仅是提供了一个平台，让两人由“不知觉”地结识转换为“知觉”地结识而已。换言之，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的结识应以庆历三年（1043）为起点，而非学者们所言庆历四年（1044），曾巩引荐王安石于欧阳修之时。

再言，嘉祐元年（1056）乃是欧阳修与王安石首次会面，会面以后两人相互赠诗，这本是文坛佳话，未想却传有两人“不和”之说。笔者认为两人相互赠诗一事，乃是倾慕已久的两人，相隔十一年以后会面，畅谈良久，意犹未尽，故会面以后再相互赠诗续谈而已。诗作中，欧阳修以韩愈、李白勉励王安石，表达其对王安石的器重。欧阳修期冀王安石可以成为其接班人，鼓吹古文运动。王安石之答诗则是委婉地婉拒欧阳修之意。然历来学者却以王安石于诗作中自比孟子之故而言王安

石“不敬”欧阳修。笔者认为，两人相互赠诗一事，乃是两人会面以后无法细细长谈，故藉由诗作对彼此的认识更为深入。王安石于诗作中自比孟子并无任何自抬之意，仅仅是以孟子来表达其于政坛上的追求而已。欧阳修与王安石两人于赠诗一事以后，不时皆有聚会晤面，故此历来学者以赠诗一事言两人之间的关系“不和”乃是不妥的。

王安石自庆历二年登进士以后，一直皆欲有所表现。嘉祐二年（1057）在欧阳修的推举下，王安石入京为群牧判官。然在其于京师任职的两年内，王安石不曾安心，请求外任高达十多次。王安石自少年便已定下其志向，欲惠利百姓。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轰动了当朝文坛。《明妃曲》二首标新立异，大胆创新，使一众大臣纷纷唱和。考究王安石的生平，笔者发现王安石创作《明妃曲》以前曾上万言书于宋仁宗，提出了宋朝弊病以及改革方案，然不得仁宗回应，使王安石极度失落。经过笔者分析论证以后，发现王安石于《明妃曲》中表达了其未得仁宗“知心”的感慨，然其感慨之语却被学者误解，言王安石背君父之恩。

王安石于诗作中强调“知心”，而欧阳修在唱和之时，亦表达了其对王安石的相知。欧阳修对其唱和之作亦颇为得意。王安石之《明妃曲》虽引来后世学者多番争论，然却未有影响欧阳修与王安石之友谊。欧阳修阅王安石之诗，对于王安石所强调的“知心”是深感认同的。为此，欧阳修也唱和了二首之多，内容皆与王安石相去不远，可见欧阳修与王安石是相知的。

总的来说，笔者认为历来学者们对于王安石的评论都过于苛刻，于嘉祐元年（1056）其与欧阳修相互赠诗一事以及嘉祐四年（1059）王安石作《明妃曲》二首一事，两件事皆言是王安石与欧阳修“不和”之故，然学者们的评论多有误解，不可尽信。笔者认为，作为后辈的王安石对欧阳修的态度是即倾慕又崇拜的，而欧阳修亦非常赏识王安石。两人于嘉祐元年（1056）至嘉祐四年（1059）的关系都非常良好，且由倾慕之情转为相知之情，这是两人感情深化的阶段。故，于此阶段欧阳修与王安石是无任何“不和”的。

ⁱ文中所提欧阳修与苏轼的生平交游乃是参考自王水照、朱刚著：《苏轼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以及孔凡礼撰：《苏轼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ⁱⁱ文中所提《答段缝书》、《与祖择之书》、《上人书》等篇文章，皆参考自王水照、高克勤编撰：《王安石散文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ⁱⁱⁱ文中所提《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答曾公立书》等文章参考自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王荆公文集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

^{iv}文中王安石《明妃曲》解读乃是参考自汪国林：〈论北宋文人雅集唱和诗作的议论性与闲适性——以《明妃曲》和重阳之会为考察中心〉，《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以及周玲：〈《明妃曲》文化意蕴解读〉，《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

^v文中所提《思王逢原》、《思王逢原三首》等诗歌乃是参考自王安石著，李壁注：《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vi}文中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一诗之解读乃是参考自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页97-99。

^{vii}文中欧阳修《再和明妃曲》一诗之解读乃是参考自张鸣：《宋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页99-100。

参考书目

一、古籍

1. [汉]班固撰，颜师古注（1962），《汉书》，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2. [南朝]范晔撰，李贤注（2009），《后汉书》，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3. [唐]韩愈撰，屈守元主编（1996），《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4. [唐]孙樵（2003），《孙可之集》；[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宋]陈鹄（2003），《耆旧续闻》；[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6. [宋]陈师道（2007），《后山谈丛》，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7. [宋]葛立方（2003），《韵语阳秋》；[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8. [宋]龚颐正（2003），《芥隐笔记》；[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9. [宋]李焘（1986），《续资治通鉴长编》，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0. [宋]欧阳修撰，洪本健校笺（2009），《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1. [宋]欧阳修撰，李逸安点校（2001），《欧阳修全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2. [宋]阮阅（2003），《诗话总龟》；[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3. [宋]邵伯温(2003),《邵氏闻见录》;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4. [宋]释惠洪(2003),《冷斋夜话》;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5. [宋]苏轼著,孔凡礼点校(1986),《苏轼文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16. [宋]王安石撰,李壁笺注(2010),《王荆文公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7. [宋]王安石撰,李之亮笺注(2005),《王荆公文集笺注》,成都:巴蜀书社。
18. [宋]王安石撰,秦克、巩军标点(1999),《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 [宋]吴子良(2003),《荆溪林下偶谈》;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 [宋]吴开(2003),《优古堂诗话》;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1. [宋]吴曾(2003),《能改斋漫录》;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2. [宋]叶梦得(2003),《石林诗话》;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3. [宋]叶梦得(2003),《避暑录话》; [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4. [宋]员兴宗(2006),《九华集》; 曾枣庄、刘琳,《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5. [宋]曾巩撰，陈杏珍、晁继周点校(1984)，《曾巩集》，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26. [宋]朱弁(2003)，《风月堂诗话》；[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7. [宋]朱翌(2003)，《猗觉寮杂记》；[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8. [元]脱脱(1985)，《宋史》，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29. [明]茅坤编，高海夫主编(1998)，《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西安：三秦出版社。
30. [清]吴景旭(2003)，《历代诗话》；[清]永瑢、纪昀，《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专书

1. 蔡上翔(1994)，《王荆公年谱考略》；詹大和等撰，《王安石年谱三种》，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2. 陈衍编、秦克整理集评(2008)，《宋诗精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3. 程俊英、蒋建元著(1991)，《诗经注析》，北京：北京中华书局。
4. 高步瀛(1959)，《唐宋诗举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5. 葛洪撰，曹海东注译(1984)，《新译西京杂记》，台北：三民书局印行。
6. 洪本健(1999)，《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7. 黄进德(1998)，《欧阳修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8. 吉川幸次郎、李庆(1987), 《宋元明诗概说》,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9. 孔凡礼撰(1998), 《苏轼年谱》, 北京: 中华书局。
10. 李震(1997), 《曾巩年谱》,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11. 刘德清(2006), 《欧阳修纪年录》,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 逯钦立(1988),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 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3. 彭定求(1960), 《全唐诗》, 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4. 王水照、朱刚著(2004), 《苏轼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5. 王水照、高克勤编撰(1997), 《王安石散文选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6. 詹大和(1994), 《王安石年谱》; 詹大和等撰, 《王安石年谱三种》, 北京: 北京中华书局。
17. 张鸣(2004), 《宋诗选》,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8. 张祥浩(2006), 《王安石评传》,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三、论文

1. 陈湘琳(2010), 《欧阳修的文学世界与生命情境》, 复旦大学博士论文, 复旦大学, 上海。
2. 周玲(2001), <《明妃曲》文化意蕴解读>, 《抚州师专学报》, 2001年第2期, 页78-82。
3. 唐眉江(2003), <宋代昭君诗类型及其解读>,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第1期, 页8-12。
4. 殷康焕(2008), 《唐代昭君诗研究》, 兰州大学硕士论文, 兰州大学, 兰州。

5. 汪国林(2009),〈论北宋嘉佑文人雅集唱和诗作的议论性与闲适性—以《明妃曲唱和与重阳之会为考察中心》〉,《毕节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页78-82。
6. 吴宝明、高升(2009),〈关于宋代及之前的昭君诗概述〉,《安徽文学》,2009年第11期,页185。